

## 甲午前夕《申報》輿論中的日俄觀

◎ 陳 鵬

《申報》創刊於1872年，為晚清民國期間中文報紙中規模影響最大者。考察其在甲午戰爭時期的政論於後人瞭解那場戰爭、那個時代頗有裨益。拘於篇幅，本文所及將僅限1894年1月1日至戰爭爆發前的7月24日。

### (一)

19世紀末葉的1894年，正當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之時。由於發展的非均衡性，列強重建世界政治秩序的爭奪勢不可免。寰宇之內，波譎雲詭，陰雲密布。《申報》敏銳感知這一脈動，認為時泰西各國形勢，「較諸周末之七國，漢末之三國，南北朝之分裂殆有甚焉」，「不出數年必有大爭戰。」<sup>1</sup>而尤致意於俄，指其「不能得志於西，必將肆意於東」，<sup>2</sup>中國與之壤地相連，決不能置身事外。

1月3日《論俄人築路》言及俄國築西伯利亞鐵路事，指出「俄人必將肆志於亞洲。故極意講求鐵路，逐漸推廣，駸駸乎有日新月盛不能自己者。」認為俄人之用意與他國不同，不在通商而在土地。「英法的美皆商國也，所重在商。與中國交，利在通商，並非在侵地。西伯利亞鐵路地方多荒寒，則商務亦必不如他處，何欲以急欲築此路？俄人之志已灼然可知焉。」所以「中國之邊陲豈能長享安靖？烏得而不防？必也！琿春之中國地界亦當有鐵路以便運調重兵以資防禦。」

2月17日《質之七章》追述了俄國歷史沿革，詳敘彼得大帝改革及克里米亞戰爭失敗事，強調「俄之不得志於地中海，必逞志於太平洋，此必然之勢。然則彼之封豕長蛇所欲得而甘心者，不於中國是屬，將誰屬乎？」

2月19日《論山海關接造鐵路事》指出鐵路有益於防俄之處：「俄之與我壤接地連，素負虎視鯨吞之志。苟有鐵路由天津直達東三省，則調兵轉餉，朝發夕至。凡畿輔重兵及近京各省鎮守之旅皆可遙為後援，脈絡相貫，不啻合數省之兵為一省之防。」

類此強調防俄文字尚有多處，而對於日本威脅卻少提及，僅見於1月27日《聞朝鮮亂耗書後》，「本人（對朝鮮）已屢生覬覦，大有以琉球相待之意」，而同時亦不忘「俄人東封之心未嘗息也。」

4月17日《論汰補練兵》稱中國練兵「此時最為先務之急而尤要者在乎東三省」，用意自在於抵禦北方強俄。

《申報》這種在防務上重俄輕日的傾向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的轉

變，即自1885年中日天津談判後，清政府錯誤地將首要戒備對象定為北方的沙俄。致使後來戰爭爆發之時，只能倉卒應戰，焉得不敗。<sup>3</sup> 深層原因乃廣泛存在於中國士大夫心目之中對日本的輕視。<sup>4</sup> 除了注意到俄國（當然也還包括日本）威脅之外，《申報》在四月下旬疊發《兩粵邊情問答》、《滇省邊情問答》、《籌滇耳食錄》<sup>5</sup> 三文，提醒當局不可忽視西南、兩廣邊境安全，稱「英日之蠶食與法人無所異，法人以安南為詞，英日以緬甸為詞，皆有所覬覦而深入者在也。」

強鄰環伺之下，此間《申報》政論中有大量與國防軍備有關的內容。1月9日《防敵莫先於埋伏論》具體介紹了防守海口之法；4月6日《書裁兵電信後》開篇即道：「國家之盛衰恒與兵事相終始」，突出了軍備的重要性；4月9日《論德國精於製造》稱「軍械船艦製造之精，則向以德國為最」，中國應「遴選聰穎子弟入德國各廠肄業」，認為是「因時制宜之要政」。4月25日《湘軍營制述》，6月24日《德國水陸軍政考》詳細介紹了湘軍和德軍軍制，有引為借鑒意；5月28日《增設船政學堂論》主張增設船政學堂，造就駕駛人才，因「方今國家鄭重海防，須才孔亟」。

同時《申報》還對當時軍備廢弛的現狀提出了痛切的批評。3月30日《經武篇》論「顧自寇亂收平以來迄今以三十餘年矣，海波不驚，烽燧永息，（軍隊）技藝生疏，老弱充數，軍實不齊已也，尤患在兵額之不足。」

如果站在近代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申報關於加強軍備的輿論又可以放進洋務思潮的範疇。簡單說，洋務派於「數千年未有之奇局」下，主張變革，且多指向器物層面。與之相應，《申報》此間亦非泥古，主「政教禁令悉視時勢為變通」，所涉除軍備外，尚有：

3月12日《論北洋創設西醫學堂》倡發展西醫，與中醫相得益彰；6月18日《中西教養得失論》指出「科舉只有時文一途，舉天文地理格致曆算一切有用之書、有用之學皆屏之使不得見」，期國家廣設學校、圖書館、博物院以養才。6月19、20、21日三論中西交涉損益，陳中國與西方交往中於領事、游歷、商賈、傳教、醫藥、萬國公法諸方面吃虧之處，認為中國應該學習西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挽回利權。6月11日《論日本工藝製造之精》指出發展商務的重要，「古者重農而賤商，崇本而抑末，至今而時勢為之一變。蓋商務之興廢，即國家之貧富所繫，強弱之所關。」

《申報》此間輿論於改變君主專制政體持反對態度，所謂「天下大矣，人民眾矣，所以能群居萃處相安於無事者，恃有君焉耳。」且將法、俄等國中反專制，求進步的力量目為「亂黨」，尚未體察到洶涌的民主自由浪潮，而認為西國「亂黨」成因是「西國中古時人心純樸，拿破侖第一在位後人心之純樸者變而為澆漓。」其潛臺詞是要維持三綱五常的傳統倫理不難想見。所謂「治國者必清其源，所謂源者則亦正教術以端志識而已矣。」<sup>6</sup> 雖然也提出「國之所以不治者，以下情不能上達，上意不能下行，以致兩相隔閔。」但僅認為其關鍵是「門上」作梗。<sup>7</sup> 如果以中體西用作為洋務思想的總括，那麼《申報》輿論雖涉及了西用的種種，但對中體的突破還大有局限，核心的政教制度仍未觸及，這也印證了此間《申報》輿論未超越洋務思想樊籬。

## (二)

六月中旬以後，朝鮮事日亟，中日雙方均已陳兵相對，《申報》政論與戰爭更加息息相關。

歸納起來，主要涉及幾個方面：

### 1、日本觀：

6月11日《論日本工藝製造之精》給日本以高度評價：「日本自維新變法以後，上而制度典章，下而百工技藝，無不步武西法，二十餘年來所造就之人才已形濟濟，工藝之事亦無不造其精微。積以歲月，必有更出新法以駕於西人之上者。」並認為中國亦應近鑒日本，發奮自強。隨局勢發展，為免長他人志氣，又開始貶抑日本，就明治維新云，「日人每好大喜功，自明治中興維新政起，事事仿行西法，不啻步亦步趨亦趨，亦只具體而微，未足與西人抗衡者。」<sup>8</sup> 針對其國力稱，「日本國小地瘠，財盡民窮。」<sup>9</sup> 指摘其國民性道，「日人狡獪，何嘗有一信字於其間？」<sup>10</sup>

### 2、戰事將成的原因：

正確地將責任歸於日本一方，並分析了日本挑釁的原因。

首先日本維新以來，驕氣日生，「於我中國也若玩之於股掌之上」<sup>11</sup>，「一若天下莫有能與之抗衡者，二十餘年載所購之艦，所練之兵，從未輕於一試，深恐棄置不用，適此次高麗亂作，不免躍躍欲試耳。」<sup>12</sup>

其次「亦我中國有以啟之也，天津會議專款三條，遂為今日興師之張本。」<sup>13</sup>系指條約給日本以出兵朝鮮之權。

複次，認為是俄國作祟，「日本之所以鑄成此大錯者實為俄國之所誤。取道朝鮮以通太平洋，此俄日之夙願也。惟有陰以圖之，用旁敲側擊之法而暗助日人圖之。」<sup>14</sup>

再次，認為日本狃於琉球臺灣諸役之小利，得隴望蜀，「侵臺者，滅琉之見端也，滅琉者，將來並朝鮮犯中國之漸也。」<sup>15</sup>

再次，「日本之所以敢於興師者，豈不謂今歲恭逢皇太后六旬萬壽，不欲輕啟兵釁。」<sup>16</sup>

凡此，都可作為戰爭爆發原因加以羅列，但緣其未能點破帝國主義侵略本質，則有隔靴搔癢之感。

### 3、戰和之論：

基本上堅持了主戰的態度，首先堅守中國與朝鮮之間的封貢體制，「夫朝鮮之為中國藩服豈一朝一夕也，」<sup>17</sup> 進而推導出中國為保朝鮮而與日本從事疆場的正義性，且從功利考量，「我有朝鮮為藩屬既可為我之門戶，又可為我之屏蔽」，<sup>18</sup> 所以「中國為朝鮮必當與日本力爭。」<sup>19</sup> 甚至還對高層在開戰問題上的遲疑表示不滿，「而主持大局者慮遠思深，不免過於持重！試問朝鮮之事（不戰）能乎不能？」<sup>20</sup>

同時亦受傳統的和平主義影響，對西國居間調停持肯定態度，以為「果若如此亦如天之福

也」，因為「縱令中國大獲全勝，而軍實耗損已多，商賈亦不無被累。」且「中日兩國同處亞洲，為東方大局之所關係。高麗實為中國之屏蔽，亦即日本之屏蔽也。彼眈眈窺伺其旁者久已處心積慮。」所謂眈眈窺伺者當然是指俄國而言。在防俄與保大局的目標驅動下，主中日親善，「兩國當念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誼，無事則共輯邦交，有事則各禦外侮。如是而後高麗安，高麗安而東方大局可保。」<sup>22</sup>

具體到調停的操作，則出於對俄的疑懼，懷疑當時俄國願為調停的動機，認為「不免動人以疑」，而「此事果由英國出為調停，其事不難裁定」，表現出親英的色彩，稱其「以商務富，以兵力強，仗義執言為歐洲諸國懾服」。<sup>23</sup>「歐洲諸國群推英執牛耳，其說可信。」且俄早為英國大敵，英國「亟出而弭中日兩國之兵，實所以止遏俄人。」<sup>24</sup>

對俄的疑懼，對英的信任，與日共保東方大局的願望，程度之烈，甚至在中日之戰一觸即發之時，熔鑄出一個荒唐的念頭，即「今日欲弭縱衡之釁，宜謀捍禦之方，莫如結英以自固，說日本以為我助。」<sup>25</sup>

#### 4、勝負之論：

《申報》此間政論還對未來戰爭的勝負進行了樂觀的預測，這也是其主戰態度的信心源泉。7月1日《答客問高麗事》分析了中日軍事力量對比，認為「日本兵制雖取法泰西，然二十餘年來從未有戰爭之事」，不足為懼；而「我中國南北洋水師兵艦不少於日人，槍械不遜於日人」，且回溯昔年中法之役，認為中國軍隊抵禦歐洲強國「勝敗尚能互見」，當然更不把「蕞爾小邦」日本放在眼裏；加之對中國當時的前線指揮官評價甚高，「葉轟兩軍門所向無前」，所以告誡日本，兩國相爭，「正不知鹿死誰手！」

7月11日《戰必勝說》又從中國傳統的戰勝之道——天時、地利、人和來進行分析。認為日本東京地震是天心示警，此失天時；海口眾多，處處可攻，此失地利；黨派林立，人各一心，又失人和。而中國自仿行西法以來「凡事皆一洗因循之習」，軍隊曆練，民眾同仇，所以對日本「尚何有懼哉？」

7月23日《論中國之兵可勝日本》重申前述論調，對戰爭保持了必勝信心。

#### 5、一些策略問題：

7月24日《論出於戰必持之以久》提出了“緩戰”的可能。

認為中國地大物博，而日本「幅員不足當中國二三省，邇來國用浩繁，外強中槁」，且「中日通商，日人之利大。一旦商人並行停止貿易，則其國中必當有變。」所以日本不足以支持長期戰爭，透出一點持久戰的意味。

另外，《申報》在民眾注意力都集中在朝鮮之時，還注意到孤懸海外的臺灣，認為「防海當扼其要」，而臺灣「地方遼闊，出產頗足以動人」，所以「臺灣一隅為中國海防中所最關緊要之區」。證之後來戰爭進程，應該說是很有見地的。<sup>26</sup>

統而觀之，《申報》在甲午戰爭前夕的輿論堅持了民族主義立場，對日本的挑釁予以批駁，對中國的反侵略鬥爭加以贊賞，基本堅持了一種主戰態度。（至於從實利出發，討論戰和策略，不在本文視野之內。）批判當時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深切希望中國變法自強。之所以有如此立場，蓋由於《申報》雖系英商美查所辦，不會放棄英資產階級利益（政論中對英國的贊賞以及親英色彩即為明證），而惟其辦報首要目的是謀利，當然要更多考慮中國讀者的愛憎好惡。而報館的一批秀才主筆，雖在經濟上為洋人謀利服務，但在政治上有一定獨立性，懷著對國家民族的憂患意識，喚起民眾，一致對外，自強救國，表現了可貴的愛國主義精神。<sup>27</sup>

《申報》的見識當然也有許多錯謬淺陋之處，如誤判當時中國最大威脅為俄國，如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惘然不覺，如對戰爭勝負的判斷，如對英法德美等國的認識，如對自強路向的主張等等。但後人皆應堅持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不可苛求古人。

此外由於作者並非一人，各人水平參差，觀點有異，或為求時效性，行文不夠縝密等原因，《申報》政論也有前後矛盾之處。如對日本的前後不一的體認；如既指出英法對中國西南的蠶食之心，又稱其欲僅在通商不在土地等，尚須留意。

#### 註釋

- 1 《申報》1894年4月6日《書裁兵電信後》。
- 2 《申報》1894年3月30日《經武篇》。
- 3 詳見《甲午百年祭：多元視野下的中日戰爭》（北京：知識出版社，1995）載潘向明《論甲午戰爭前十年間清朝的國防戰略失誤》一文。
- 4 參見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75。
- 5 見1894年4月21日、22日、24日《申報》。
- 6 見《申報》2月27日《論治亂黨貴清其源》，3月19日《弭兵說》。
- 7 見《申報》1月31日《上下之情宜通說》。
- 8 見《申報》7月1日《答客問高麗事》。
- 9 見《申報》7月24日《論出戰必持以久》。
- 10 見《申報》7月10日《論戰事將成》。
- 11 見《申報》7月10日《論戰事將成》。
- 12 見《申報》7月1日《答客問高麗事》。
- 13 見《申報》7月1日《答客問高麗事》。
- 14 見《申報》7月12日《論日本之謀朝鮮將為俄人所誤》。
- 15 見《申報》7月10日《論戰事將成》。
- 16 見《申報》7月9日《攘日議》。
- 17 見《申報》7月14日《論日使致書問朝鮮是否中國藩屬》。
- 18 見《申報》7月16日《論必保朝鮮以固東圍》。
- 19 見《申報》7月9日《攘日議》。
- 20 見《申報》7月21日《論中國為朝鮮不可不與日本一戰》。
- 21 見《申報》7月15日《備日議》。

- 22 見《申報》7月4日《論日本不應與中國籌兵》。
- 23 見《申報》7月2日《宜聯絡與國以禦外侮》。
- 24 見《申報》7月17日《論俄國助中》。
- 25 見《申報》7月2日《宜聯絡與國以禦外侮》。
- 26 見《申報》7月7日《台防為今日之急務說》。
- 27 參見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6），頁10、24。

陳 鵬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七期 2003年8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七期（2003年8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